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宁海党史资料

(一)

中共宁海县委宣传部 编印
中共宁海县委党史办

一九八四年六月 日

目 录

革命
史料

亭旁暴动…………… (1)

梅花村会议…………… (13)

烈士
传记

柔石烈士传略…………… (18)

朱学勉烈士传略…………… (28)

烈士
诗词选

柔石烈士 (二首) …… (43)

包定烈士 (四首) …… (51)

朱学勉烈士 (十二首) …… (53)

亭 旁 暴 动 (初稿)

(一)

亭旁，原属宁海县（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分县后属三门），离县城约七十华里。当时是反动统治薄弱之区。地主土地高度集中，剥削极重，农民一直不畏强暴，敢于与反动势力相抗，反动统治者苦于“难治”，不敢轻惹。自从宁海县委把全县农民工作重点放在亭旁区后，先后派杨毅卿、包定、林泽荣、杨大才、蒋建人等到亭旁指导工作，特别是由于包定、叶信庄、梅其彬、任畴等的积极努力，终于打开了这一地区革命局面。先是在亭旁包庄、杨庄组织“穷人会”、“壁虎社”，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十月底，包家村的农民协会开始在包家祠堂诞生；一九二八年初，在亭旁五庄的范围内，东至金坑、梅家、赖岙、南溪，南至芹溪、下吴、梅坑胡，西至上鲍、上蒋、任家，北至邵家下叶、下路朱各村都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自从有了自己的组织，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了停止粮食外运、实行平粜、提高短工工资等斗争，使土豪劣绅暂敛声迹，大长了农民的威风。梅其彬在南溪，更是以身作则，革命先从自己家搞起：宣传减租，先从自己家减起；缴田契，自己家先缴出。革命同志来往频繁，全家热情接待。他能把家里所存的粮食、银币等用于革命。特别为了搞武装，梅其彬等曾日夜四出活动，不但在南溪村，甚至到挂廉、坐塘等偏远山区进行深入细致的动员工作。同时他们还以胡仁喜等一批掌握武器的人为争取对象，进行教育改造，使其提高觉悟，投入革命队伍。当时能临时武装起百余人。武器大

多是土枪和火药枪，也有少数洋的，还有手枪，重武器有猪娘炮一尊。这不仅为以后亭旁实行暴动打下武装基础，也为与土豪梅长恕直接较量准备了实力：一九二八年清明日（四月五日，即农历闰二月十五日），梅长恕为霸占族田，竟借以幼凌长之由，举枪逼吓敢于揭露其劣迹的地下党员梅其真，激怒了百余名农会会员，在梅其彬等发动下，以武装包围了梅长恕院子两昼三夜，使其不得不于八日遁逃至桥头村匿起。此后农民协会有了更大的发展，至亭旁暴动前，亭旁、珠岙两区已成立区农民协会，全县各地普遍发动组织，会员达二千人以上。

为了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一九二八年初，省委派王瘦竹（定海人）、杨毅卿等到亭旁主持建党工作。这年春节于丹邱寺召开预备党员会议，当夜在包沼光家举行了入党宣誓。并成立了亭旁区党团领导机构：包定兼区党委书记，任畴、叶信庄、蒋周材、杨宏治、任少野为委员，邵茂范为区团委书记，梅其彬、包沼光为委员。当王瘦竹来县传达了中央提出的革命方针后，三月六日宁海县委向省委的报告中就提出采取暴动的政策。三月十五日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在关于政治方面决议案中，提出“准备暴动”的口号；并说明暴动是艺术，是斗争的最高程度，我们应当集中力量，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做各种经济斗争，进至为政治斗争，武装暴动起来；在目前实力不够时，应加紧本身工作，增强自己的力量。一九二八年三月十六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台州地区有温岭、宁海代表参加。三月二十四日，省委又作出关于台属六县决议案：“省委决定浙江党的工作前途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前途。由农民的游击战争，乡村暴动达到割据的前途。省委这个认识的依

据，乃是浙西浙南农民革命情绪之高涨。经过一个短时间的准备和斗争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乡村暴动的前途。”在此期间，为了贯彻以上会议和指示精神，在县委的指导下，作出了调整亭旁区党团机构成员的决定：包定调任县委负责组织工作，梅其彬任宁海县团委委员，任畴任亭旁区党委书记，叶信庄、包沼华为委员，叶宝鉴（陈春）任区团委书记，包沼光、应振民（女）为委员。党团区委建立后，亭旁区工作进展更快。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全区党团员发展到七百多人。包家、任家、梅家西山及其他多处党支部相继成立。其中梅家西山支部党员发展最多，包括西山本村及附近板沸、刘家、铁场各自然村的党员达四十多人。至武装暴动前夕，宁海党的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和壮大：县委已有执委十一人（知识分子三人，工人三人，农民五人），常委七人，县委经常负责常委三人，一任亭旁区工作，一任珠岙区工作，经常留城区是县书一人，其他也负责各区工作，区委，六区中除海游区外，其他各区负责同志较健全，能经常工作，尤以亭旁及珠岙两区为最活动；支部七十以上，党员九百以上，以农民成份为最多。武装力量也开始组织，亭旁已编就农军一连，珠岙也准备编农军一连。

（二）

温岭县委书记管荣德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接到省委调任台州特派员的信后，在召集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四县联席会议后，即于十日动身来宁海巡视，并实践省委五月廿日去杭之约（后因宁海武装暴动而推迟）。管至宁海巡视后，即提出“武装暴动”的主张。开始，蒋如棠、包定等认

为条件还未成熟，曾提出异议。管遂继县委在十日左右团省委特派员曾策来到宁海召开党团县委联席会议之后，又于十五日左右召开县委会议。当他了解亭旁、珠岙两区前阶段农运工作情况之后，就很肯定地指出该两区将要由经济斗争转到武装斗争的更高阶梯，必须以游击战争的方式造成割据局面。会议在他的主持下，作出了如下的决议：发动各地的抗麦租、散工加工资、反对加粮和实行平粜等经济斗争；在各项斗争中巩固和扩大党及农会组织；各项斗争经农会通过，立刻行动；各项斗争须走到武装斗争的地步；亭旁、珠岙两区在各项斗争中，须迅速进到游击战争的阶段；亭旁、珠岙两区应作好编制农军及少年先锋队、扩大农会组织、改造党的组织、加紧土地革命宣传等游击战争的准备。会后管又率同杨毅卿、徐孝慰等五六人到亭旁，得知散工加工资已实行，抗麦租已发动，并有胜利可能，反对加粮呼声很高，而平粜则因地主土豪为谷贱而藏其谷不肯粜，农民因平粜反而余不到谷，所以对地主豪绅异常愤恨，要求捕杀，尤其是武装农民，表示更为强烈。上月清明节“南溪事件”发生后，谣言蜂起，传说伪军、警将到亭旁“围剿”，梅其彬、梅其广两兄弟因此更是赞成提前武装暴动；杨毅卿、徐孝慰也同意立即发动；包定、叶信庄等至此亦觉得已有了武装暴动的条件，“动就动吧！”表示服从上级的决定。

五月二十二日（农历四月初四日）下午三时左右，任家支部负责人到区委报告，说要在晚上开平粜会议，把反对平粜最力的地主豪绅任禹玉、任友端诱入会场打死。区委和在亭旁的县常委包定都同意这样做。因考虑任家支部无武装，而地主豪绅有快枪二十余支，恐难达到目的，就决定调动各村的农民武装并约好任家农会于夜八时，至迟在八时半开，武

装人员须在八时前齐集某地出发。区委负责同志在七时前已到某地等待，各村农民武装因农忙，要收拾武器，又要等人，第一批只来十二人。恐误时间，包定即率这十二人先到任家。任家农会正在开会，地主豪绅也出席，到会群众六十余人，包定等十二人因考虑武装人员少，未曾下手，伏窥其散会而去。到九时半，到任家的武装农民六十余，因会已开过，地主豪绅已走，也只好怏然不快而回。当时有几个活动农民，为不使武装人员对党及负责同志失去威信，便积极建议继续再干。因此区委召开了活动分子会，决定于次夜（二十三日夜）继续行动，准备捕杀任禹玉、任友端、任升初，并以此作为游击战争的开场。任升初系恶讼，曾为梅长恕拟电报稿向伪省政府告发，群众亦恨之入骨。为除任家三害，二十三日（农历初五日）夜十一时，来农民一百五十人先在丹邱寺集中，编队后于下半夜一时向任家进发，时天大雨，群众浑身淋湿，但仍斗志昂扬。到了任家，在包定的指挥下，先去包围任升初家，准备将其捕杀。因任升初逃逸未获，再去包围大贪官大土豪任禹玉家，准备收缴其武器（任禹玉曾任国民党某师军需处主任，曾窃取巨额军饷，并带回一批枪支）。只因任禹玉房屋坚固，又有武装防守，无法突破，包定即令武装人员转攻地主任友端家（部分人员留下继续围困任禹玉家）。先用大石头撞任家大门，未破。后由林宜横用匠斧将大门砍了个大洞，叫梅其广进洞（那时其广只十五岁，个子小），从门里把大门打开。不想此时任友端已跳窗潜逃。暴动人员一涌而入，怒不可抑，就一把火烧了任友端的房子。时近黎明，大部分人员散回家去，留下的五十余名武装人员则整队往南溪。

在管荣德到亭旁了解情况，进一步统一有关人员发动武装暴动认识后，即于五月二十日夜在谷仓岭头由包定等主持集中了亭旁、海游、珠岙、桑州四区部分武装人员二百五十余人，举行预备会议，讨论提前武装暴动事宜。当即决定暴动，设立红军指挥部；推选包定为红军总指挥；确定暴动的总纲领口号；要求亭旁、海游、珠岙、桑州各区分头做好暴动的准备工作；并由杨毅卿赴县委报告一切。会后，武装人员还乘夜就地进行了军事演操，以检阅自己的力量。以后，任家事件一发生，实行暴动的呼声更高，声势更大了。在此情况下，至五月廿四日（农历四月初六）上午，县委书记芦经训、县委特派员杨毅卿赶来亭旁与台州特派员管荣德商定当夜又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及红军指挥部。由包定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指挥，梅法金、任畴任付总指挥。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部（部长任畴兼、付部长胡仁喜、王显时），财政部（部长包本开），运输部（部长任少野、付部长邵宜民），交通部（部长胡积玉、付部长杨成董）。梅其彬当时虽未担任军事职务，但实际参加了各部工作。他年青有为，革命热情很高，哪里有困难，他就到那里去。如暴动前搞枪支、搞给养及派哨瞭望敌情等要务，都落在他的肩上，工作始终很忙。红军队部设在包家包子聪家，战士驻扎在城隍殿。五月二十五日晚在丹邱寺集武装农民计到二百二十四名，编三十名为冲锋队，一连为主力连，其余按营连队组编制，归总指挥部指挥。由革命委员会主席宣布革命委员会决议，由台州特派员管荣德讲农军责任等。这时到会农民个个斗志昂扬，会场气氛异常热烈。当夜并开革命委员会，讨论关于占据亭旁后的一些工作。是夜大雨，武装人

员衣服全湿透，但仍非常雀跃。

武装农民正式举起义旗的日期为五月二日六日（农历四月初八日）。这天拂晓，暴动部队占据亭旁，连同群众千余人。军械大多为土枪、火药枪，快枪、手枪不多，其余则持红缨枪、长矛、剑等旧式武器。暴动部队均以红布为号，干部左臂缠红布，战士大襟挂条红布，汇成一条洪流涌向亭旁街，齐集城隍殿。在那人头攒挤群情振奋的大会上，县委向全区宣布解散当地所有反动机构，庄严宣告亭旁区苏维埃政权成立，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口号声、鞭炮声响成一片。接着，在国民党亭旁区分部门前升起第一面镰刀、斧头大红旗。革命委员会并向群众出示布告；布告的主要内容：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实行共产革命，焚烧契据，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还向群众阐明革命的主张政策，张贴了“打倒蒋介石”等标语，并决定逮捕反动豪绅（拟捕者有梅长恕、邵咏棠、杨雪亭等），向一般地主派粮派捐收缴枪支。会后，在亭旁街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当时的亭旁街确是沸腾了，到处是鲜红的标语、传单，群众欢欣鼓舞，竭诚拥护革命政权，纷纷自动要求参加暴动部队。

自五月二十日夜在谷仓岭头举行武装暴动预备会议以后，珠岙、桑州、前童、天台的洪畴戴、欢岙、临海的大田、两头门农民武装千余人汇集于珠岙街。五月二十五日夜在珠岙叶家祠堂举行集会，一致推举陈祥为珠岙区红军临时总司令，决定先支援亭旁暴动，然后惩办本区土豪劣绅。一切准备就绪，部队待命出击。同时桥头胡、梅林一带也按县委通知组织了六、七百人的一支部队，以十五人为一班，三、四班为一排，一百人为一连，上面是大队长，并发给印信、臂

章符号等，还买来二十余支土快五枪。亭旁暴动前夕，专门在梅林村边的团空山地方开了三、四百人的会议，商议参与亭旁暴动事宜，并派出哨兵，与亭旁取得联系。

在亭旁农民武装暴动的枪声打响以后，亭旁区的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均即闻风逃遁，而包子聪、任禹玉、任友端、杨雪亭等还分别忙向伪省政府、伪省防军司令部及伪宁海县政府告急，伪县长黄懿范得知消息即密飭南乡伪军、警侦查追缉和电求伪军增兵到地“围剿”。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我革命委员会获悉情报，反革命武装伪省防军第五团（驻海门）和临海的伪军已集合在临海的车口、东塍等地，宁海的伪军已进入珠岙，驻海游的伪省防军郑俊彦连亦蠢蠢欲动，亭旁处于夹击之中。为了对付这突变的形势，于是革委会即紧急开会。当时革委会认为当天部队秩序较乱，武装人员已一连四夜没睡，恐难指挥防守及作战，因而有计划地将部队撤至亭旁附近，拟待伪军窜入亭旁时再包围上去。可惜该晚撤退之令未发，武装人员已散去三分之一。据此情况，我红军指挥部当机立断，即一面组织精悍力量向南溪方向撤退，一面连夜派交通员分别去海游、珠岙等方向联络，告知各路义军就地疏散，待令行动。

五月二十七日（农历四月初九日）黎明，从海游来的郑俊彦连三十人（号称几百人）向亭旁举兵。但伪军慑于我军队声威，虽弹药齐全，却逡巡不敢贸进。后悉义军已离亭旁，才鼓噪而入。伪军侵占亭旁街后，强抢豪夺，叫嚣一时。包定由于廿六日夜在红军指挥部就近家中住宿，廿七日早晨与部队失去联系，被敌军包围，经化装农民潜出亭旁脱险。我主动向南溪撤去的精悍部队，在管荣德、梅其

彬、陈春（叶宝鉴）、邵茂藩的率领下，得知伪军已入亭旁，一致主张迎战。几位领导人员遂分路调兵：一路至南溪，一路至上模陌更，一路至板沸，另一路至寺前岩。并约好等上模路军集陌更（距亭旁四里）后，以火炮为号，各路齐取亭旁。还商定：如伪军向陌更进兵，我板沸一路武装可袭其后；如伪军向寺前岩进兵，我上模路军可袭其后。下午我上模路军才抵陌更时，即先与从亭旁来犯的伪军在狮岭与陌更附近接火。因板沸方面武装未来包抄，我上模路军即退据虎陇头（离亭旁六里，三面环山似口袋形）扼险阻敌。敌人见我兵力单薄，大举进犯，当伪军尚未进入我射击范围时，可惜我武装人员看见伪军即首先开枪，暴露了目标，仅毙敌二人，伤一人，未能把全部伪军诱入我射击范围之内，予以痛歼。那些荷枪实弹的伪军见我义军固守山头，即在山下向我猛烈还火，但不敢向上冲。双方战斗相持甚久，直至天色已晚，敌不敢与我再战，旋提兵窜回亭旁。至次日晨，部分伪军又从亭旁潜来南溪，向我守据在叶家山岗高处的上马攀山头的义军进犯，亦败回。

虎陇头与上马攀山头之战，我军以低劣的武器装备，击退数倍于我之敌，给反动派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后来，反动派大举进犯，又因临海方面的伪军由金坑岭抄我后路，我腹背受敌，且弹尽援绝，为了保存实力，待机再起，指挥人员决定武装人员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后我退据在大莱山上的红军部队，在梅其彬、叶宝鉴、梅其广的率领下，尚有武装人员二十多人，他们在极度恶劣的环境条件下，还在附近山上坚持一个多月。在伪军占据亭旁前，另由叶信庄率领撤退至湫水岙的一支农军，在二十八日晚散去一部分

外，留下的二十余人也曾在寺前岩一带山上坚持了一些时日。

二十八日，管荣德等到珠岙区。二十九日，县委常委在珠岙区开会，管荣德与包定、芦经训、陈祥等县委主要成员重又碰头，虽作出了一些坚持游击战争的临时措施，而在会议上意见分歧，县委多数成员认为此次武装暴动不应发动，并以军事人才缺乏，决定管荣德去省委，付以讨论。管遂于三十日离宁海去杭州。

宁海亭旁暴动失败以后，白色恐怖严重。伪军在进攻亭旁路上，先有我联络员王孝足（党员，小坑桥外王人），还有农民胡老邓（南溪上模人）被捕，两人一起于农历四月九日在亭旁街被砍头示众，惨遭牺牲（王被连砍六刀）。邵茂藩（原名自藩），暴动失败后，失散赴宁海找关系，路经桑州，因足上胶鞋沾泥浆，经伪警疑查被捕。二十六七等日，宁海城内的潘子贤、顾楚琴因被伪县长嫌疑而被捕。伪军在亭旁大同学校搜获了县委古历三月初五日印发的“县字通迅第一号”后，发觉住城内市门头已脱逃的季太才（号学勤），加罪为驻城通讯之总汇而追缉、抄家。宁海中学也因此发觉。是各区、支书与县书联系所在地而被重大嫌疑遭解散。包定、梅其彬、叶信庄、陈春等武装暴动负责人员均被通缉，蒋建人，许杰、柔石（赵平复）等党的工作人员和进步人士均在极度艰危的情况下脱离险境，易地斗争。方惠文（女）、愈岳因参与和支持武装暴动而出走，路经石浦被奸细俞明条告密而被捕。梅其彬叔父梅连江因平时支持侄儿革命，在大莱山前头庵被捕后被打穿手腕押至海游街示众。亭旁区各领导人员和农会干部的房屋被捣毁，财产被洗劫，甚

至拘捕家属，敲榨勒索，损失惨重。反动豪绅包子聪、杨士燮等除联名要求伪省防军第五团葛瑞维排留驻亭旁镇压外，并分头组织反动武装“保卫团”，以张其势。农民如有尾欠租粮的，知识青年若对反动政府稍加议论的，即被诬为共党，横遭逮捕，搞得人心惶惶不安。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至一九二九年上半年，浙南特委和台州中心县委先后派周炳文和县委书记袁佐文等来宁海恢复党的活动，都因白色恐怖的严重影响而开展不起来，不少党团员与武装人员只得作长期埋伏，等待时机再起。

(三)

宁海亭旁暴动是在党领导下的我省农民暴动的先声，是有很大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领导下全国各地先后发生的一百多次农民武装暴动中的一次。

对这次暴动，党中央在一九二八年六月给浙江省委关于亭旁斗争以及今后工作的八点指示中首先指出：“这次亭党部能够利用农民在生活最痛苦时期（青黄不接时候）发动当地农民平粜抗捐抗麦（租）及加资的斗争，并且根据当时群众斗争的要求与情绪，聚集农民用游击斗争的方式去求群众斗争的扩大与发展，中央认为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策略。”

亭旁暴动这一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伟举，发生在蒋介石老家奉化的邻县，在当时不仅吓坏了远近地主土豪劣绅，而且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

但是，亭旁武装暴动的失败教训也是深刻的。当时台州特派员管荣德等一部分武装暴动的领导者，在条件尚未具

备、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勿举义旗。他们只看到一时一地的革命情绪，而没有正确估计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敌我力量悬殊的基本形势。虽有认识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还未认识到当时社会特点，反动势力强大，民主革命有其长期性和复杂性，必须根据党在农村革命的总任务，创造条件，实行武装割据并作好暴动前的充分准备。正如党中央的八点指示中所指出的，亭旁暴动的一些错误是应接受教训的。

梅花村会议（初稿）

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古历正月初六、七日），在宁海西乡白岭根村葛希曾家召开了浙东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为重建浙东游击根据地，开展台属地区武装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浙东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援助，拒绝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的正义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党的工作方针，必须立即从“长期埋伏，精干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转变到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游击根据地。中共浙东工委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是由顾德欢代表上海党委宣布中共华中分局决定将浙东党委托上海党领导。在传达党中央上述政治形势和任务，汇报各单位工作后，分析了浙东情况，认为国民党仍重兵放在四明山，台属是国民党控制的薄弱地区，确定浙东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台属，将新（昌）、嵊（县）、奉（化）地区与台属合并成立中共台属工作委员会，由邵明任书记，并决定由浙东军事干部张任伟来台属负责办理发展武装的有关事宜。

为了贯彻“上海会议”的精神，经慎重研究，选定在宁海西乡白岭根村召开浙东干部会议。为开好这次会议作了周密安排。由前童党组织专派党员周松贵以接大商人的名义从宁波接来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杨，同时以白溪为界，分内外线

分工保卫。外线由县工委委员童先林、杨民奎负责，内线由白岭根村党员葛希曾负责。外线又分几路落实：官地由杨民奎负责，密切注意竹林、马鞍岭方向动态；小汀由童先林负责，密切注意梁王、古岫岭方向动态；前童党组织指派专人密切监视乡公所内动态；桑州方向由桑州支部负责；三门方向由沙柳支部负责；王爰山岗方向由党员褚洵负责；另又布置党员童遵时、童仲达在城区观察动态送情报。

会议地点的白岭根村，位于宁海县城到前童、岔路、桑州的大路以南，紧贴六琴岗下的一个小村，地点比较偏僻。村里有不少人在宁波、上海等地做竹、木、泥水匠和裁缝，除了两家小地主、两家富农之外，大部分人家比较困难。而葛希曾的一家的情况是：葛希曾和他弟弟葛道吾都是共产党员，他父亲、母亲、爱人、妹妹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都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早在1940年，台属党的联络点之一就设在他们家里，当时又是台属工委负责人的住处。希曾的父亲葛新善，一心拥护党，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我们地下党的秘密交通联络员，经常为地下党同志送信、送文件、带路、取款子，后来组织上动员他当上个伪保长，利用这个合法身份掩护地下党同志进行工作。希曾的家在白岭根村的最南边，门前是六琴岗，房子前后两个道地，二层楼的旧式瓦房。前道地住了六户人家，后道地住两家，出后门就是山脚，门外辟了一小块菜园，进出方便，环境幽静。那时正是春节后不久，与会人员借走亲访友、拜年、做生意等各种名义，在开会前的几天陆续到了他家里。在开会的几天里，希曾全家都出动了：他的父亲在门前劈柴、扫地观察动静，他的弟弟带了几个小朋友四处游玩，实际上在望风放警戒，他的母亲、

爱人、妹妹烧菜做饭，送茶送水，使与会人员大有宾至如归之感。

正式会议开了两天。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顾德欢（代表上海党委）、刘清杨（浙东工委书记）、张任伟（浙东军事干部，后为浙东二纵队参谋长）、许少春（台属工委副书记）、应为民（临海、海门、黄岩党的负责人）、童衍孝（宁海县工委书记）等人。会议由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杨主持。首先由顾德欢代表上海党委传达党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今后党的任务的报告，由刘清杨传达了“上海会议”的精神和具体地阐明今后台属武装工作的方针。继而许少春作了1943年至1947年初原台属党工作的总结汇报。会议对台属过去的工作表示满意。

在“上海会议”上，曾决定将隐蔽在上海郊区的有美式配备的武装拉來台属，作为开辟台属工作的主力，由张任伟同志具体负责该部队到台属来的有关事宜。张任伟同志考虑：这个部队骨干很好，班以上干部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武器也很好，卡宾枪、汤姆枪、机关枪都有，子弹也很多，实力很强，但是这个部队长期没有打过仗，而且长期在浦东那一个富庶平原的生活环境里面，一下子拉到台州，要爬山，能不能适应有顾虑。为此提出建议——是否先去台州跑一趟，搞一点调查研究再定。上海党委同意他的意见后，即来台州，先乘轮船到海门，然后至临海大石、宁海前童等地了解得知情况复杂：一是台州的国民党军官比较多，如临海有陈良、周至柔等，国民党的大官也不少；一是台州的地主土顽多，台州的“绿壳”是有名的；还有一个特点，封建的宗族斗争比较激烈，象大石有什么上党、下党，这个派、那个派，氏族、

宗族观念比较厉害。在比较复杂的清况下，如果把那样的浦东部队拉到台州来，能不能站得住脚是个大问题。回上海后因此提出暂时不带浦东部队的建议，还是先到台州，依靠当地的党组织，依靠当地的群众搞武装，要求上海党委支援几个干部，给一些武器弹药。上海党委同意了这一意见。在会议上，张任伟同志在说明以上情况和意见后，并对三门湾附近地下党组织的分布，中上层统战关系，国民党县区乡镇驻军兵力、武装配备，沿海潮汛、暗礁及海匪武装、对我政治态度等作了较详细的汇报。

会议对党的方针转变后，各县党组织的工作，敌占城镇战略情报工作的建立与搜集，对国民党地方土顽基础武装工作及海陆股匪中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并决定抽调各县党的骨干党员，由张任伟同志负责培训武装干部，在政治路线的贯彻和组织方面作准备。

会议在倾听原台属党组织有关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后，认为临海县山区与沿海有较好的开展武装斗争的关系和条件。会议决定台属工作的重心放在临海县，成立中共临海县中心县委，由邵明兼任书记。

会议结束后，上海党委代表顾德欢凝视着窗外飘飞的大雪，沉重地说：此次会议结束了地下党“长期埋伏、精干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地下工作总方针，是台属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关系着台属党与台属人民的命运，自此次会议后，待打开台属武装游击斗争的局面时，为了追忆这一会议，在此村建立一碑以示纪念。当时冰封大地，积雪盈尺，环绕着白岭根村梅林梅花盛开，清香扑鼻。“雪虐风号愈凜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